

可持续性转型治理的重建和解构

秦佳良¹, 贺明华²

(1. 上海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200093; 2. 井冈山大学 教育学院, 江西 吉安 343009)

摘要: 本文以转型管理为重点, 回顾了对可持续性转型的一些批判和质疑。虽然这些质疑促进了理论进展, 但潜在的认识论问题依然存在。本文阐述了对转型管理及其隐含复杂性范式的一些批判是如何建立在对复杂性的解构主义认识上, 这对复杂系统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影响朝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提出了质疑。对转型管理的批判需要认识如下几点: ①转型管理需要解构力(迄今未充分说明); ②同时具有“超越”解构主义的明确追求。为此, 本文提出了一种“重构方法”作为转型研究的认识论基础, 这种重建方法分为3个方面: ①超越“是”和“应该是”, 倾向于“可以是”; ②诠释性和自反性研究; 以及③可持续性的“实践智慧”。

关键词: 转型管理; 可持续性; 复杂性; 解构; 重建

中图分类号: C93; G3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980X(2020)10—0138—08

转型治理的结构变化已经成为了社会科学领域的挑战之一。转型被定义为社会变革的非线性过程, 社会体系在结构上发生了转变。可持续转型通常指的是“朝可持续社会的根本性转变, 作为对现代社会面临的一系列持续问题的回应”。转型研究的一个核心前提是持久性问题为不可持续社会的症状, 为了获得更可持续的系统, 必须处理这些持久性问题, 需要具体子系统的革新以及超越个人系统的转换, 包括各种不同规模和长时间的系统创新。转型是协同演化的结果, 当社会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单个子系统的动态时, 就会导致不可逆转的变化模式。

转型研究的基本理念根植于若干重要的理论传统, 包括复杂适应性系统、整合评估、后常规科学、演化经济学、创新研究、技术转型等, 这些不同的理论范式之间存在着一些共性: 作为研究对象的各个系统是开放的, 不断演化的; 外部环境的变化影响着系统; 系统本身呈现非线性的发展以适应环境^[1]。多层次视角是理解常规创新、渐进式创新如何被政体结构化的框架, 而利基实验, 政权变化和长期情境变化会产生转型。虽然转型研究最初的关注点是社会技术系统的转型, 满足特定的社会需求(如动态系统、能源、农业等), 但最近的进展已经将概念延伸到其他分析单位(如区域、城市)和可持续发展的自反性治理^[2-3]。就分析重点来看, 对转型过程的认识可以从理解参与者如何影响转型过程进行区分: 研究的第一个对象被称为转型动力学, 另一个则是转型管理, 转型治理或战略利基管理。然而, 尽管它们可能被区别分析, 但发展路径却紧密联系。转型研究正处于被大量研究的热潮中, 像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一样, 转型研究也受到了褒扬和批判。本文试图审视其中的一些批判和质疑, 以理解其隐含假设, 并阐述转型研究的实际含义和应用, 以期促进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一、转型管理: 批判与回应

(一) 对转型研究的批判

转型管理(transition management, TM)关注的是某一社会系统的结构变革和动态行为, 以及这一变革的内在机制和复杂影响, 如交通部门、能源供应系统、农业部门、水资源管理等^[1]。转型管理是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模式), 这一理念的形成依赖于强调自然选择和变异的达尔文进化论, 其目的是为实现可持续转型创造

收稿日期: 2019—11—2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创新驱动情境下新员工悖论内涵结构、动态演化及领导干预策略研究”(20YJC630042); 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项目“在线教学环境下的学生内在动机和参与度研究——以上海高校工商管理专业本科生为例”(ZZslg20017); 江西省吉安市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共享经济可持续性促进消费者持续共享意愿的机制研究”(20GHB273); 上海理工大学博士启动费项目“调节定向与个体创新的关系研究”(BS-QD2020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互联网+背景下社区共享平台用户持续使用行为研究”(20XSH020)

作者简介: 秦佳良(1989—), 男, 湖南益阳人, 博士,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技术经济及管理; 贺明华(1980—), 男, 江西吉安人, 博士, 井冈山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教育经济及管理。

动量和契机,从而解决社会体系中长期存在的痼疾^[4-5]。它在探索和设计的基础上不断地调整和扩展,以研究转型动态和转型治理。演绎法和理论开发结合归纳和实证研究设计,包括建模方法和行动研究。复杂性理论、治理理论和社会理论被用于开发治理方法、管理工具和政策工具,这些工具反过来又根据实证检验和行动研究经验加以调整。

早期转型研究中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权力和政治缺乏关注。正如 Meadowcroft^[6]所指出的:“转型管理并不是主要关心社会目标确定和修订、集体决策执行及资源权威性分配的政治过程。它也不关注社会价值、价值冲突的演变,以及个人和家庭生活的领域,群体身份的定义,以及公民身份。然而,所有这些领域都对社会变革的进程很重要,与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有关”。

其他研究者指出,现有社会技术体制的结构性力量拥有策略机会对转型管理及可持续性治理的直接管理性认识构成挑战,因为并不清楚这些与现行政策制度和政治过程之间的联系。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可持续性的概念用得太过笼统。尽管关于转型管理的研究强调了可持续性的模糊性和主观性质,但对于这种模糊性和围绕可持续性的战略博弈的政治含意,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可持续性的概念在战略解释上显示出了延展性,那么,一个有远见的先行者开始的转型管理过程真的能推翻结构上的固有机制吗?对战略解释和延展性的关注不仅适用于可持续发展,也适用于更广泛的转型管理。有一种政治转型管理,是对何时以及如何决定(进行干预)的权力博弈,这不能隐藏在“后政治”共同可持续利益诉求的暂时幻想之下。他们强调,有必要对政治转型管理进行反思,将其视为一套可识别的想法,让参与者和机构明确地定位自身,并追问“转型管理的标签是什么”。转型管理模型模糊了“易变的和有争议的边界制造和定义能力问题”^[7]。

相关研究者还表达了对研究人员参与转型政治的担忧。目前存在的转型管理模型由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其他从业人员通过各种政策领域的行动研究联合制定^[8]。这引发了质疑:尽管许多研究人员完全有能力分离他们的双重角色,但这种双重角色可能会掩盖分析的结果。参与政策实践或创新项目可能会成为实际分析过程的障碍,这使得很难对研究人员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诚实正确的诉求^[9]。这将对定义权力的上述担忧扩展到研究人员:不仅社会行为者可以将转型话语用于战略解释,研究人员也可以用它来影响可持续性问题的框架。无论这本身是否有问题,批判者强调,研究人员的这一角色需要更严格的审查。

(二) 回应批判

关于转型管理的质疑性讨论促成了一系列研究:如何在转型中设想权力、政治和话语。关于可持续性的批判已经得到阐述,需要更加关注其本质:作为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和对持续社会问题的回应。最近,转型管理作为跨学科行动研究方法已经解决了许多关键问题^[10]。

虽然这些研究已经对转型理论进行了丰富和修正,但认识论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特别是那些关于战略解释、可塑性、定义权力和转型研究者的双重角色的质疑,更明显地提出了对转型研究者角色的担忧(无论是在学术工作还是参与转型治理)。“关于认知者和什么可以被知道”的类似质疑揭示了认识论的观点^[11]。

传统的转型研究在理解转型时超越了实证主义本体论,即超越了现实主义和原子主义。它们并不减少力量与物体之间的直接线性因果关系;而且它们不会假定研究中的系统具有确定性的可预测性。因此,这些研究人员在讨论转型治理时并不认为该系统可能简单地被控制,而是寻求:①以一种后实证主义、后牛顿主义设法尝试影响、塑造或调节一个系统;②认识到这样做的尝试是容易犯错误的,因此必须嵌入到学习和反馈的过程中。

传统转型研究大都采用后实证主义方法。在社会技术传统中,政权内部以及政权与利基实验之间的相互作用被理解为多重的,有时是间接但不一定是线性的。它们详细阐述了协同进化的概念,同时明确地没有将其减少到路径依赖,包括路径创建和多条路径的相互连接。自反治理方法也采用了明确的后实证主义观点,其中已经详细阐述了如权力和授权及双轨治理。

二、复杂性、转型管理和解构

(一) 复杂性、转型管理和解构

来自有机系统数学研究的复杂性范式最近进入了社会研究领域^[12]。它的不同表现形式都针对那些显示行为的系统,这些行为不是简单地或者根本不能简化为系统组成部分层面的交互合作。我们无法解释这

种现象:如通过累计所有潜在的相互作用(即道路基础设施的特征和行为,交通管制,汽车和驾驶员之间)产生的交通拥堵。非线性系统中的一个元素看似很小但无关紧要的变化可能导致系统巨变,即所谓的“蝴蝶效应”。例如,伦敦市的“交通拥堵计划”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产生了新颖的社会实践模式,从而减少了拥堵^[7]。更具体地说,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CAS)理论更加明确地关注系统从经验中学习和适应自身的能力,并对外部变化做出反应^[13]。在转型管理研究中,这被认为提供了必要的框架,使我们能够包含社会复杂性的所有特征,如异质代理和人工文物,二元论和结构,涌现,惊奇和不确定性,因此,在以社会学的见解为基础时,足以描述和分析社会系统^[4]。

按照复杂性范式,社会可以理解为由形成彼此环境的各种复杂适应系统组成。这些系统的内部动态是复杂的,并且这种复杂性随着系统与其周围环境以及彼此之间的交互作用而增加。转型管理已经发展为对实证观察、行动研究归纳理解和政策干预的结合,以及对来自社会学、治理研究和复杂系统理论的演绎认识。Rotmans等^[14]以转型向一个新的动态均衡进行系统转变为特征,包含非线性和(协同)演化过程,他们将转型管理视作一种“比变革有更多的演变”方法,因为它试图利用存在于现有系统中的转型机会,并结合持续的动态而不是强迫变化^[14]。在后来的工作中,更深入地指出了复杂系统的基本原理和对治理的作用。

Loorbach^[3]根据复杂性理论制定了治理原则,其中包括:承认流程和内容如何不可分割(流程管理需要对系统内容理解),使用长期思维(超过25年)作为政策设计框架,保持政策目标的可调整性和灵活性,兼顾均衡和不均衡,促成系统内更多参与者加入。转型管理的前提是社会体系的渐进式变化可能会在长期内转变为激进的转变。这种前提在理论上是从社会系统的概念化推导出来的,即作为一种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缺乏刺激与反应之间的线性关系;因此小规模刺激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并导致激进的变化。从操作意义上讲,与可持续性愿景逐步关联的渐进变化,是在政策谈判中将流程和内容联系起来的一种努力形式,但它并不意味着要对长期流程或决断性流程结果的控制。社会变化长期过程中固有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颠覆了这种规定性的变革方式。转型管理的信息和前提是:尽管存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但仍需要努力实现可持续性转型。

(二)对复杂性的不同理解

为了阐明转型管理的认识论定位及其与复杂性的关系,有必要承认对复杂性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并且复杂性可能与不同的认识论解释有关。例如,一些研究者已经讨论了复杂范式、后现代主义概念和解构主义之间的关系。Cilliers^[15]指出,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奠基人)已经明确地将复杂的事情与意义、背景问题相互联系起来,并强调意义和知识总是具有偶然性和情境性,背景也必须被解释。Cilliers^[15]回应了一些关于复杂性、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错误理解,并得出结论认为复杂性不需要导致模糊或相对论的陈述,而是对知识保持谦虚的立场;“我们可以提出强有力的诉求,但是由于这些诉求是有限的,我们必须谦虚地对待它们”。在治理方面,复杂性范式对“将实际问题归结为一系列技术问题策略的信念”构成挑战,并认为需要对如何理解复杂性影响并应该影响治理的思想基础进行批判和反思。

然而,解构复杂性观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争辩说“忠实于复杂系统理论”的含义不是“我怎样才能将系统治理变为新的吸引点(我想要的)”而是“我在这个系统中的作用是什么,我和其他人的行为如何影响系统”。这些观点通常对转型管理的理念至关重要,我们可以或应该将复杂的社会系统引向更理想的状态。本文认为对转型管理的一些批判质疑让人联想到这种解构主义的观点。例如,Shove和Walker^[7]质疑“更好的理解认识必然会提高管理能力”这一假设,并批评一些想法“转型管理有意进行干预以追求特定的目标,如可持续发展,是可能的并且可能有效”。

这些批判回应了一些转型管理学者的观点:“更深入地理解复杂适应系统的动态,可以提升对其导向可行性的认识”,并且“复杂性理论的应用可以用来指导复杂适应系统”并将“复杂的适应系统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16]。Rotmans和Loorbach^[2]描述了复杂系统的特征,并指出“存在的挑战是详细阐述这些管理复杂系统的准则,同时将它们应用到社会系统中。问题在于这些简练的原则可以应用于社会系统达到何种程度。隐含的前提是社会系统是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它还需要在复杂性理论的形式化、演绎抽象和持久的、复杂现实世界之间进行一对一的转换”。

关于转型管理与复杂性之间关系的描述可以被理解为从分析动态到指导干预的实证主义转变。本文认为,在转型管理研究中更多的认识论上的细微差别和说明是必要的,以强调这里的“指导”概念并不是指来自

外部的传统控制,而是指一种类型的控制——它是复杂系统动力学的一部分。尽管转型管理学者坚持认为分析复杂社会系统的动态机制是可能并且可取的,并且使用这种分析可以促进有利的发展规范进行,但他们任何时候都不坚持认为这些知识是客观的或必须带来提升。正如 Loorbach^[4]所强调的那样:“社会系统或子系统的关注点都是任意的”“子系统之间没有客观的边界”。任何本质上是不确定的理解、复杂性和非线性是所有干预的特征,干预行为者可以做的只不过是基于对这种理解的干预,通过适应干预来监测系统如何演化,并相应地调整策略。因此,基本上,它成为了复杂适应系统的一部分。这是自治的本质,常常一个观点相混淆,那就是治理是不可能的。自治意味着治理系统是控制体系的一部分。因此,转型管理隐含的复杂性范式本质上质疑转型管理者处于可以从外部引导系统的一个独特位置。

(三)解构和转型管理

既然本文阐述了转型管理的认识论定位及其与复杂性的关系,有必要更加仔细地讨论对复杂性的其他理解,如解构方法,及其如何与转型管理相联系。根据解构主义之父 Weitzner^[17]的观点,“解构”不是“什么”,它也不可能是一种这样或那样的“什么”或一个确定的“它”;解构只能是正在运动中,或者,在“待产中”的事件本身,是正在“在场呈现”和“活生生地显现”的事件。Weitzner^[17]确实扩展了解构主义的含义,即“中断一个结构”。这种“结构中中断”已经在诠释性的、后实证主义研究传统中得到普及。它的任务是“消除连贯性的错觉,在仔细阅读时揭示文本如何解构,从而揭示它们所缺乏积极内容”。Weitzner^[17]创造的解构主义这一术语,用于阅读文本的哲学方法,后来超越哲学领域渗透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并最终成为流行文化的常用语。本文在这里广泛使用“解构主义逻辑”作为一种方式,通过阐明它们的隐含假设并说明其他制度来一起“解开”社会和科学实践。因此可以看出,解构逻辑在规范上不一定反映后现代的观点,如它也可以通过批判理论的视角来被熟知。

在这个基本意义上,尽管到目前为止大多数转型批判者都不能从原始含义上被理解解构主义者,但其中一些质疑本质上是基于解构主义逻辑。Duineveld等^[9]描述转型为相互执行的社会雷达,可被视为齿轮。并解释了这种可视化的潜在隐含假设,认为这一描述说明了转型管理是如何“基于技术性的、机械的社会视角”。其他基于解构逻辑的对转型管理的批判质疑包括:“我们越是思考自反性转型管理的政治和实践,这个过程就越复杂:对于政策受众而言,我们谨慎的言语可以被理解为放弃努力。如果代理、可预测性和合法性如我们所建议的那样有限,这可能是唯一明智的结论。”“过程分析的一个更重要,更普遍的功能是产生‘负面建议’或解构。在研究中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来研究产生(政策)工具作为研究结果是毫无意义的。因此,‘负面建议’可以通过预先设定可管理性的限制来节省大量的能源、金钱和其他资本”^[9]。

这些类型的质疑,部分基于解构主义逻辑,是科学对话的一种有价值的形式,引起人们对未被理解的要素(如权力)的关注,使研究人员对他们的主张表现得更清晰和谦虚,并提醒在谨慎分析时保持专注。但是,当我们认真对待解构主义时,还有必要问为什么以及我们正在解构什么。为了解释 Bernstein^[18]对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可能会问:“以什么名义解构?”。Bernstein^[18]认为,所有的语言游戏都有语法,质疑必须有一个标准:不是在实证主义的基本意义上,而是作为历史上一个偶然的出发点,通过解释不作为语境而起作用。“对当代社会的无知和不公正的批评,不管是否显而易见,通过简单的提醒(以设计变革社会只会变得更糟糕)都被取消了资格。由于证明手段的无效性,替代性目标是无效的。”这可能是强有力的和相关的,必须知道以良好意图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和有害路径。其中有充足的隐含假设:为防止从中产生不必要的影响,本身需求解构,如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用这段话暗示唯一正确的决定是根本不干预。这是研究者真正推动的吗?本文认为解构是科学批判和质疑的重要价值部分。同时,有必要提出“以什么名义解构”这一问题,并对解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产生的新构念保持质疑。

转型管理本身具有固有的解构力,通过解构潜在范式和对社会制度的控制来中断构建。这里解构的对象是针对构成现有政体的实践和结构。因此,解构是以质疑现有政体的名义完成,包括解构那些政体合法化的潜在科学方式或方法(如“效率”或“经济增长”等概念)。“政体解构”通常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活动,而且还有助于产生工具性建议:重建新政体被应用者认为是更好的。然而,解构本身的基本逻辑和方法是相似的。转型管理和更广泛的转型研究,以现有政体的重要解构为出发点。尽管对转型管理和其他可持续性治理方法的质疑性审查同样重要,但探索转型研究如何帮助分析现有实践、体系及潜在科学范式的隐含假设、问题和意外影响也是有用的。Duineveld等^[9]这样阐述:“对社会、政治和政策过程的分析可以用来指明政策隐含

假设、问题和意外影响,以此作为使人们和机构的思想、行动成为持续批判对象的方式。那可能是反思和变革最重要的一步。没有批判质疑,政策就会陷入自己的思维方式中反抗力很强大,从而强调质疑和抵制是触发(体制)变革的必要条件。正是从某个科学(政策)研究过程可以发挥其非科学用途和合法性。”

因此,即使不是典型的,研究人员解构隐含假设、问题和意外影响,从而预先制止政策被陷入“中断构建”,这也是合理的。本文认为,转型管理本身并没有将现有的实践和结构视为理所当然,而是涉及了对现有政体的解构,同时也旨在“超越”解构。

三、转型治理的重建观

虽然明确承认解构的有用性,就可持续性和转型的解构而言,本文的目标是通过明确提出一种称之为“重建”的方法来阐述转型管理超越解构主义的意图。通过以下几个流程重建:①中断和质疑根深蒂固的概念和实践;②(重新)构建新的或适应性的概念和实践;③取代/补充那些被解构的概念和实践。

(一)超越“是”和“应该是”,转向“可以是”

对一些人来说,“重建”与“解构”方法之间可能存在矛盾。这涉及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基本辩论:那些旨在“描述”和“解释”的人之间;那些希望“指定”和“预测”的人之间;以及那些呼吁理解事情(物)如何“是”和那些强调理解事情(物)如何“应该是”的人之间。更广泛地说,康德、哈贝马斯和法兰克福学派追求的批判社会理论主要占据后者,公开定义其作为社会发展的社会研究目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各种社会科学家对批判理论的启蒙方法提出了挑战,并要求重新评估马基雅维里、尼采和福柯提出的见解。Brocklesby等^[19]提出从哈贝马斯转向福柯,认为其是“批判社会理论的另一种固有缺陷”,强调理解事物如何“是”的优势,而不是关注他们如何“应该是”。

Bent^[20]也提出了类似的言论,他强调理解现有权力关系和权力与理性相互交织本质的重要性,同时开始接受“实践智慧”。Arendt^[21]通过呼吁研究者敢对“应该”(不)是什么做出规范判断来让社会科学产生作用,并回答以下“实践智慧”研究问题:①我们去哪里?②通过哪种权力机制谁有收获和谁有损失?③这种发展是否可取?④我们应该怎么做?因此,Fischer^[22]将“是”和“应该是”方法结合到社会科学中。本文认为,转型管理和更普遍的转型研究,也将“是”和“应该是”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同时通过增加对“可以是”的研究关注来阐述这些方法。

对可持续性转型的研究不仅仅是研究某个特定时间点事情(物)“是”怎样,也不仅仅是关于他们未来“应该是”怎样。最重要的是,必须理解事情(物)在现在、将来和未来“可以是”的情况。从这个角度来看,面临的挑战就是从转型的潜力来分析现象,即从“是”什么转变为“应该是”什么的能力。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转型研究的本质也是研究事情(物)可以是什么,转型管理则是试图在由以“是和应该是”争论为主导的政治背景下运作“可以是”的哲学。

只要我们承认任何管理者是系统的一部分,将系统引导至特定平衡状态是无效的,这种状态是从一系列基于“照现在这样”的系统分析可被识别的可能“吸引子”中选择的。相反,新颖的吸引子在多角色审议实践中,将被(重新)构建,以便为进一步的集体行动提供方向。同样,这个想法不仅仅是为了分析系统,以便知道它的动态是“照现在这样”,还是为了促进动力学,这可以通过支持和突出“先行者”(从而产生耗散结构)以及通过创造和赋予“生态位”(刺激分化和共协同演化)帮助一个被展望的吸引子成为可能。最后,鉴于被识别“吸引子”的可行性具有不确定性,以及促进“期望”系统动力学的有意和无意的影响,通过实践的变化和选择也包括在内。

因此,转型管理必须满足的核心是通过系统的“可以”探索,实际取代“照现在这样”的系统分析。当然,这关键不在于对情况进行分析,而是:①使用复杂适应性系统概念来支持利益相关方的审议实践;②从情境上分析与持久性问题相关的当前多级动态;③确定可能的、理想的吸引子以及可能有助于实现它们的行动。至少同样重要的是,确实认为转型管理基本上是学习和实验的易失性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经验不断地反馈给对系统的理解。在转型管理研究中,关联认识论问题值得更多关注。

(二)诠释性和自反性研究

转型分析和转型管理可以从更好地阐明其潜在认识论地位的关键问题中受益:如何避免在“是”与“应该”之间选择科学方法?正如Bernstein^[18]所指出的,研究历史可能是批判主义的一个来源,因为它可能有

于了解“不言而喻”的实践、结构和隐含假设在历史上是否存在偶然性。承认这种洞察力,在批判诠释性哲学和社会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它允许自反代理。因此,在转型研究中探讨什么过去是,什么是,什么看起来是,人们想要什么,以及我们认为将会是或将来应该是什么,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我们需要解构和重建,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无论是实证范式还是后实证研究范式。正如Fischer^[22]所主张的那样,合理的分析汇集了不同的认识论视角,有些强调讨论因果关系“照现在这样”(或者,可能会被设想),另一些将其情境化并建立其意义,还有一些仔细研究隐含假设和情境的性质。有些自相矛盾的是,这需从本体论和认识论出发对科学研究采用特定的后实证主义、诠释性研究和自反性方法^[21]。不是为了使这种特殊的范式特殊化,而是因为与实证主义相反(其基本假设只有一个真理,在现实基础主义或相对主义之间的选择,诠释性对于世界的认识有不同理解)。

更具体地说,诠释性研究旨在自反性,即承认诠释与观察对象之间的递归关系,从而反思自己对(研究)过程的诠释和作用。自反性需要意识到研究人员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对意义构建的贡献,以及承认在进行研究时不能保持在目标之外。研究人员不能指望躲在第三人无所不知的阐述后面,即本然的观点^[23]。在转型研究中,干预行动者确实不被认为是系统的外生因素,但基本上是其中的一部分。此外,自反性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研究人员对现行实践转型的潜力和结构嵌入感兴趣。因此,自反性不仅被认为是认识论问题,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本体论现象,具有双重意义,即研究者需要反思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诠释和干预,同时承认所研究的行为者和系统也是自反的,因此具有变革的内在潜力。

许多研究者认为转型管理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旨在明确整合反思性的“自反性治理”形式^[8]。本文认为,解构有助于对隐含假设进行仔细审查,可是它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这引发了解构主义局限性的问题,任何重建当然都可以被解构,但平衡明智的审查和无尽的犹豫不决仍需得到解决。

(三)可持续性的“实践智慧”

对转型管理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可持续发展影响体系的质疑意味着强加一个具体的规范性目标。然而,这样的批判往往忽略了转型研究者把可持续性作为一个内在复杂、规范、主观、模糊和情境相关的概念。可持续性是一个典型的“有争议的概念”,这是“不可避免地涉及使用者对其正确使用的无尽争论”概念之一,“参与这种争论本身就是参与政治”。可持续性是对“以什么名义解构”这个问题的一个潜在答案,在这里再次提到Bernstein^[18]的说法,就像对这个问题的任何回答一样,这不是普遍的,但需要情境解释来将其转化为行动。不同的行为者可能也将会以不同的方式解释这个概念。

在具体的行动背景下,可能在涉及的参与者之间的协商审议中更具体地界定可持续发展,并考虑到背景特点,这种务实的判断,即“实践智慧”,试图在自反性秩序(从对理解“是”和对“应该”的偏好开始)和实际秩序(假设“可以是”)之间追寻情境性合理平衡。这不是反思的终结,而是做出进一步“反思-行动”。反思经验可能会导致行为者重新定义,他们并没有将自己定义为系统的外部因素,而是作为系统的一部分,对其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至关重要。在过程中引入的解构,可以是自反的实践,也可以是其他领域,并可以做出判断。它可能使参与者更好地意识到他们自己和他人的假设(协商审议的基本条件)以及这些假设的形成和历史定位(自反性的基本条件)方式。解构也可能触发后期的学习。

“实践智慧”过程并不是极好地分离开,而基本是嵌入的。在不同政体中,诸如“转型管理域”或“转型实践”这样的审议领域也可能处于各种其他领域中,从中继续进行重建的过程会不断受到挑战。正是在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面上,(重新)构建的正当性可能会受到争议,最终被采纳的决策可能产生其他重建的合法性。当然,决策总是会排除一些观点,正因为如此,持续的解构和重建对于进一步的学习过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触发器。

四、结论

本文回顾了一些关于早期转型研究及其相关可持续发展治理概念的批判和质疑,并着重分析了转型管理。虽然一些早期的批判已经被采纳并激发了理论发展,但潜在的认识论问题仍然存在。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论基础可以帮助转型研究者更加连贯准确,特别是在如何认识转型和影响转型方面,这是一个在认识和影响之间迭代的过程。这样的表述也有助于批判者更好地理解转型管理的本质,激发更具体的评论,进一步激发转型研究人员发展该领域。本文并不是对批判进行干预,更不是否认其内在价值;相反,本文希望强调

的是,一个新的领域需要接受批判,而这可能是由双方的准确性来推动的。

本文讨论了转型管理研究的认识论假设及其隐含的复杂性范式,将其与其他关于复杂性的观点进行对比,尤其是在解构方面。阐述了一些关于转型管理的批判是怎样与解构逻辑内在连接的。解构逻辑在广泛地作为社会科学实践及其潜在假设的审查工具,比如复杂系统可以被影响到一个预期的方向。然后,本文讨论了如何更好地从对转型管理的解构批判中获益。当我们承认受批判的转型研究对社会科学实践有关假设采取解构的立场时,建立这种批判的机遇就会出现。更重要的是,许多转型研究都致力于超越一个解构的位置,朝着本文所说的重建的方向发展。转型研究比其传播人员迄今为止所承认的批判中受益更多,因为它能使社会秩序的解构变为可能,然后超越这一点,朝潜在替代的未来重建,重建方法可以分为3个方面:①超越“是”和“应该是”,转向“可以是”;②诠释性和自反性研究;③对可持续性的实践理解。

尽管转型管理强调了利益相关者互动,实践和监督的需要,但它可以运用更多的反思原则,通过解构,可以审查和反思怎样做,无论是转型管理研究人员明确参与解构主义分析,还是其他人的解构批判;另一方面,那些强调持续解构批判意识的人可能更好地在他们自己喜欢解构的倾向和所有重建都同样错误的反对意见之间做出区分。这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它忽略了如果重建植根于有意识的变革性判断过程中,它就会产生影响,这些过程嵌入在其他领域可以接受的试错学习过程中。科学并不仅仅从外部批判转型过程。因此,解构主义的一个自反性就是以什么名义解构转型和治理方法。有些人可能以促进更可持续的情况为名;其他人可能会以被排除在外的人或物的名义讨论分析。这两方面对于改善人类条件都有贡献。只要“以什么名义”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行动可能通过解构就会无效。即使我们认识到解构的不可阻挡性,但务实的判断可能有助于决定继续行动是否有意义,并在下一轮迭代中继续解构。

参考文献

- [1] 洪进,郑梅,余文涛. 转型管理: 环境治理的新模式[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 20(9): 78-83.
- [2] ROTMANS J, LOORBACH D. Toward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ransitions and their governance: A systemic and reflexive approach[M].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30-34.
- [3] LOORBACH D. Transition managemen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prescriptive, complexity - based governance framework[J]. Governance, 2015, 23(1): 161-183.
- [4] LOORBACH D A. Transition management: New mode of governa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 Dutch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ransitions, 2017, 42(4): 275-302.
- [5] 薛奕曦,毕晓航,尤建新,等. 荷兰能源低碳转型管理及启示[J]. 中国软科学, 2016(7): 56-65.
- [6] MEADOWCROFT J. What about the politic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ransition management, and long-term energy transitions[J]. Policy Sciences, 2019, 42(4): 323-340.
- [7] SHOVE E, WALKER G. Transition manage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shape shifting[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4, 40(4): 1012-1014.
- [8] 胡键. 大数据技术与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型[J]. 行政论坛, 2018, 25(4): 49-55.
- [9] DUINEVELD M, BEUNEN R, ARK R G H V, et a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knowing the path and walking the path[J]. Humanities Research Group Working Papers, 2017, 42(4): 303-319.
- [10] WITTMAYER J M, SCHÄPKE N. Action, research and participation: Roles of researchers in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J]. Sustainability Science, 2014, 9(4): 483-496.
- [11] 曾异. 社会认识论视域下的中国道路: 逻辑前提、多维透析及其合理前瞻[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4(1): 137-140.
- [12] 江旭. 社会科学的复杂性转向——基于埃德加·莫兰的复杂性理论[J]. 系统科学学报, 2018, 26(3): 20-24.
- [13] 王鹏,王玉珊. 基于CiteSpaceⅢ的复杂适应系统知识图谱及其可视化分析[J]. 技术经济, 2015, 34(7): 84-91.
- [14] ROTMANS J, KEMP R, ASSELT M. More evolution than revolution: Transition management in public policy[J]. Strategic Thinking Policy, 2016, 3(1): 15-32.
- [15] CILLIERS P. Complexity, deconstruction and relativism[J].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018, 22(5): 255-267.
- [16] 闫坤如. 技术-环境悖论的复杂范式视角探析[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35(2): 79-83.
- [17] WEITZNER D. Deconstruction revisited implications of theory over methodolog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 2017, 16(1): 43-54.
- [18] BERNSTEIN R J. The new constellation: The ethical-political horizons of modernity/postmodernity [J].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1992, 47(3): 101-112.
- [19] BROCKLESBY J, CUMMINGS S. Foucault plays Habermas: An alternative philosophical underpinning for critical systems thinking[J].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2006, 47(6): 741-754.

(下转第 154 页)